

【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发展的邻近性困境：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脱钩的成因与对策*

侯杰 李卫东

摘要：地理邻近常被视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然而，现实中却普遍存在地理邻近并未自然转化为经济协同的现象，使得区域发展陷入“近而不联”的困境，成为制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近而不联”现象主要表现为产业同构突显、空间结构失衡和政策协同困难。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区经济逻辑下的要素分割与激励扭曲、强中心模式带来的权能与机会分配失衡，以及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文化认同差异与认知壁垒。这就需要创新区域协同共治、优化网络空间布局与深化文化价值共建。这一结论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地理邻近；经济协同；近而不联；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1-0049-08 收稿日期：2025-09-12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据要素促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25ZDA03)。

作者简介：侯杰，男，聊城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聊城 252003)。

李卫东，男，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4)。

一、引言

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与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地理邻近未能自然转化为经济协同的现实问题，“近而不联”作为区域发展邻近性困境的主要表现，成为制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关键梗阻。这一现象既背离了区域发展本应遵循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经济规律，也与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存在明显差距。

为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境，国家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置于关键位置，为打破区域分割提供

战略指引。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将“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作为改革重点，其核心指向正是要破除深层次的行政壁垒与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并要求“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一论述不仅突出了多项战略协同发力的系统性思维，更将区域协调发展内嵌于国家现代化布局之中，标志着区域治理从单一机制完善迈向多维战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上述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不仅突显了破解“近

而不联”困境的紧迫性,也为本文展开系统性分析提供了政策依据,使得研究既能回应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现实问题,又能对接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空间治理的宏观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脱钩的成因,并基于国家战略的最新导向探讨其破解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旨在对“近而不联”现象进行学理审视,拓展经济地理学和区域治理理论的研究边界;还为破解“近而不联”困境和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为深入分析“近而不联”困境,有必要回顾与梳理其背后的学理脉络。事实上,有关区域发展中邻近性作用的研究,已积累起较为丰富的文献成果与理论资源,为本文的探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主要从知识传播与创新、制度与治理、资源配置以及环境协同等维度,探讨了地理邻近促进经济协同的具体方式。一是知识传播与创新维度。地理邻近为知识主体之间的高频互动,提供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网络基础(Capello, 1999);其也被视为多元创新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物理载体,强调其在构建创新网络、促进知识共创与技术转化中的重要作用(Cainelli et al., 2014)。二是制度与治理维度。地理邻近不仅为制度互动提供空间依托,也为区域治理网络的构建与社会资本的累积创造条件(Amin, 1999);有助于形成政策协同与治理网络,从而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和增强区域竞争力(Begg, 1999)。三是资源配置维度。地理邻近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鲍群等, 2023)。四是环境协同维度。地理邻近意味着较低的沟通成本和较强的空间溢出能力,可以加强地区间的制度合作、产业协作与技术共享,促进区域协同减排(廖斌等, 2024)。

然而,也有文献在探讨区域合作、行政区经济和空间治理等议题时,涉及了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脱钩问题。一是从行政区划视角进行分析。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政府间的竞争、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的争议、跨地域跨部门的矛盾等现实问题,均成为阻碍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蔡英辉,

2013)。行政区划壁垒导致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本地利益,忽略地方政策产生的全局性影响,阻碍地区间政策协同推进(马光荣等, 2022)。二是从行政区经济视角进行分析。行政区经济格局叠加地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实施,在发展效应上存在许多瑕疵,产生的副作用不利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统一大市场构建(刘志彪, 2022)。行政区经济主要表现为地区间产业重复建设与高度趋同、市场产品同质与过度竞争,诱发各种地方保护和行政分割行为,制约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余森杰等, 2025)。三是从空间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地区间经济联系的非对称性与经济结构的梯度化差异,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障碍,制约了要素的高效流动与区域功能的优化整合(吴小波等, 2007)。“强中心”结构的城市体系因中心地区的虹吸效应强于扩散效应,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会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吴传清等, 2022)。四是从文化和社会资本视角进行分析。文化差异造成的非正式制度冲突和彼此间不信任关系都会增加经济交往中的交易成本,使得地区间不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高翔等, 2016)。社会资本具有本地化属性,表现出明显的根植性和地域差异,会阻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张可云等, 2019)。五是从政策执行视角进行分析。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中央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容易陷入“碎片化”,造成执行效果存在差异,影响了地区间的协作效率(贺东航等, 2011)。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促进与脱钩两种观点。一方面,地理邻近是知识创新、制度互动与资源配置得以实现的空间前提,存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与促进信息流通等正向效应。另一方面,受到行政区划、空间结构、文化与政策执行效果差异等因素制约,“近而不联”现象普遍存在,削弱了地理邻近的正向效应。现有研究多呈碎片化,尚缺乏对“近而不联”的系统探讨。为此,本文聚焦“近而不联”困境,系统揭示地理邻近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协同的多元表现,并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国家战略区域为例进行实证剖析,进而阐释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路径。

(二)理论基础

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本质上体现了经济活动

的空间依赖性与区域关联性,揭示了空间因素对经济行为以及区域经济格局演化的深刻影响,属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范畴。

1.地理邻近是构成区域创新的空间基石

地理邻近通过降低知识传播成本,构成区域创新网络的空间基石。知识溢出理论强调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知识的创造与扩散高度依赖于空间互动关系,地理邻近成为推动创新要素流动的关键因素。地理邻近不仅加速了语言、文字等显性知识的共享,更为经验、技巧等隐性知识提供了非正式、非线性的扩散渠道(Marshall, 1920)。这种基于日常互动、社会网络与共同语境的传播机制,有助于构建区域性的信任关系、强化社会资本和激发协同创新。

2.地理邻近是诱发区域差异的生成机制

地理邻近通过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强化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是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的微观基础。“中心—外围”理论揭示了区域演化的规律,(Krugman, 1991)。在这一分化进程中,地理邻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一,邻近性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地区流动;其二,外部经济在空间上具有衰减性,地理邻近强化了中心地区的创新优势与集聚黏性;其三,在价格机制驱动下,外围地区要素持续向邻近高收益的中心地区转移,形成虹吸效应。这些活动持续加剧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发展落差,在区域内部逐渐固化为“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

3.地理邻近是强化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

地理邻近通过增强网络外部性与正反馈,是导致区域发展被锁定于特定路径的关键条件。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并非完全由效率决定,也会受到诸如政策出台、企业家精神和突发情况等偶然事件的影响,使得某一区域在初始阶段获得某种微弱优势,并通过知识溢出、网络效应和集聚效应等机制不断强化,形成稳定的发展路径(Arthur, 1994)。一旦这种发展路径被锁定,由于制度、技术、网络等正反馈机制的存在,该路径将具有高度的持续性和惯性,产生市场垄断或技术固化。地理邻近通过促进要素积累与增强网络效应等方式,使得区域经济具备自我强化的能力,从而在长期演化进程中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区域发展结构并产生锁定效应,制约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与协同合作。

4.地理邻近是支撑经济动态平衡的基础

地理邻近通过调节集聚与扩散力的空间作用范围,构成区域经济格局动态演化的平衡支点。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产业集聚是一个受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权衡驱动的非线性过程。随着集聚程度提高,虽带来规模经济,但也会引发拥塞效应,促使产业向外围扩散,形成“集聚—扩散”的动态循环(Fujita et al., 2002)。地理邻近在产业集聚初期通过生产要素积累致使生产成本降低,推动中心地区的快速成长;在产业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后期阶段,通过促进知识溢出和增强协同效应,有助于维持地区间的功能性联系,形成协同演化的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地理邻近既是创新扩散与协同发展的催化剂,又是区域分化与路径锁定的推手。因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能仅依赖地理邻近的自然作用,更需多元主体采取多种方式的有效介入,引导地理邻近从自发分化转向协同共进,破解“近而不联”困境。

三、主要表现与典型案例

邻近性困境源于经济地理与创新研究,地理空间的邻近虽为互动提供基础条件,但未必自动引致协同发展。其核心特征体现在:第一,多维性。协同不仅依赖地理邻近,更需制度、组织、认知及社会邻近等多种因素的匹配与共振。第二,动态性。邻近性的相互作用随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而演变;第三,互动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历史路径与当前战略在其中交织;第四,情境性。深受特定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与发展阶段的影响。从理论视角审视,“近而不联”可被置于邻近性困境的分析框架中深化理解,本质上是邻近性困境在区域治理与转型语境下的集中体现与典型化。

(一)主要表现

“近而不联”是邻近性困境在产业、空间、政策三个维度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在产业同构突显、空间结构失衡与政策协同困难。这三个方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产业同构固化地方竞争格局,加剧了空间失衡;空间失衡使得协同成本高昂,进一步阻碍了政策协同;政策协同困难放任甚至激励了产业同构。它们共同将地

理邻近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中的协同阻力。

1.产业同构突显

尽管地区间具备空间邻近性优势,理论上有利于形成高效的要素流动机制和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但在实际发展中,自然禀赋相近致使产业结构趋同,邻近地区间的经济协同性较弱。这主要表现为产业分工不够清晰、产业链协同程度低、要素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等问题(侯杰等,2020)。例如,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等中心城市的“十四五”规划均将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致力于巩固其支柱产业地位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种产业规划的重叠与趋同,加剧了地区间同质化竞争关系,导致区域产业链在空间和组织上的双重割裂,阻碍了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难以实现错位发展与功能互补,削弱了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2.空间结构失衡

在区域发展进程中,受到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地理邻近性并未有效促进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均衡化,反而加剧了“中心—外围”发展不平衡格局的固化。中心地区在市场规模、人才聚集、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以及政策倾斜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持续吸引来自外围地区的关键生产要素流入,并依托相对完善的资源配置机制,实现经济高效增长,形成了强大的集聚规模和虹吸效应。而外围地区却受到来自中心地区的强吸引力影响导致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加之产业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致使自身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这种“强中心、弱腹地”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导致区域内部出现显著且持久性的“环中心经济凹陷”现象,造成区域经济畸形发展。例如,成都、武汉等省会城市的外围地区,大量城市受到省会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致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与省会城市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发展陷入了典型的“环中心经济凹陷”困境。2024年成都GDP为23511.3亿元,位居四川第一,第二名绵阳GDP为4344亿元,成都GDP约是绵阳的5.41倍。武汉GDP为21106.23亿元,位居湖北第一,第二名宜昌GDP为6191.12亿元,武汉GDP约是宜昌的3.41倍^①。这种“一家独大”的结构性困境不仅削弱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也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

不平衡,不利于构建功能互补、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3.政策协同困难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依赖于政策层面的协调与制度安排的统一。然而,现实情况是各地区因行政层级、发展阶段、政府规划与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彼此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存在激烈博弈,导致区域政策协同难度加大,区域规划往往难以有效落实。一方面,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与执行平台,导致区域性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呈现“条块分割”特征,地区间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和政策合力,制约了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土地、财政、税收、环保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标准不统一,地区间政策差异显著,制约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资源的高效配置。例如,地理邻近意味着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连通性。由于长期缺乏规范的跨区域环境协调机制和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单一行政区的污染问题极易越界扩散,演变为区域公共危机,加剧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区域环境的整体性和公共性,要求涉及的地方政府在区域环境治理中有所作为,而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增加之间权衡,使其在区域环境治理中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李冰强,2017)。

(二)典型案例

本文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区域为典型案例,系统分析区域发展进程中邻近性困境的现实表现。这三大区域代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最高层级,分别突显出以产业同构、空间失衡和政策差异为主导的差异化协同障碍,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比较价值。

1.长三角的产业同构突显

长三角作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其地理邻近性在促进制造业高度集聚形成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引发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进而制约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从经济结构来看,2024年上海的GDP为53927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0.18:21.58:78.23;江苏的GDP为137008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3.83:43.19:52.98;浙江的GDP为90131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87:38.59:58.54;安徽的GDP为50625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04:38.73:54.23。除上海外,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第二产

业占比均在38%以上,仍在省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统计年鉴中制造业的细分行业就业人数的数据,采用产业结构相似指数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同构化水平进行测度(刘修岩等,2021)。进一步地,将制造业划分为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工业、机械电子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以重点分析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工业、机械电子制造业的产业同构化水平,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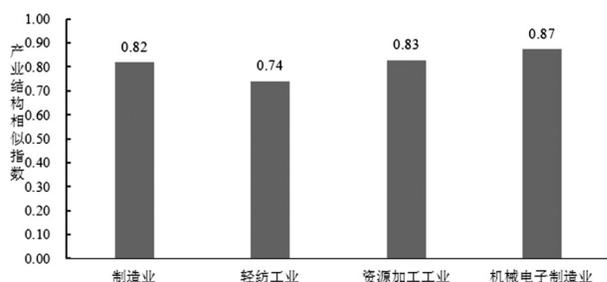


图1 2023年长三角制造业及其细分产业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

数据来源: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由图1可知,当前长三角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达到0.82,制造业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同构化特征。细分产业来看,机械电子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最高达到0.87,资源加工工业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也高达0.83,显示出长三角各省市在两大产业布局上高度趋同。轻纺工业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较低为0.74,省市间差异性相对明显。长三角制造业的产业同构特征突显,不仅导致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的重复投入与低效配置,引发同质化竞争,削弱区域整体竞争力;还制约了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链跨区域协作的形成,致使上中下游配套衔接不畅,难以有效发挥协同创新效应。

2. 京津冀的空间结构失衡

京津冀的经济格局呈现出以北京为中心的“强核”结构特征。北京的面积约为1.64万平方千米,2024年GDP为49843.1亿元,占地区的比重为43.19%,人均GDP高达22.8万元。天津的面积约为1.2万平方千米,2024年GDP为18024.32亿元,占地区的比重15.62%,人均GDP为13.21万元,为北京的57.94%。河北的面积约为18.88万平方千米,是北京的11.51倍、天津的15.73倍,2024年GDP为47526.9亿元,占地区的比重41.19%,人均GDP仅为6.44万元,相当于天津的48.75%、北京的28.25%。

不难发现,京津冀内部发展不平衡特征显著,北京在经济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进一步地,采用北京GDP占京津冀地区GDP的比重测算北京市的经济首位度,以此反映京津冀的经济格局及其演化趋势,结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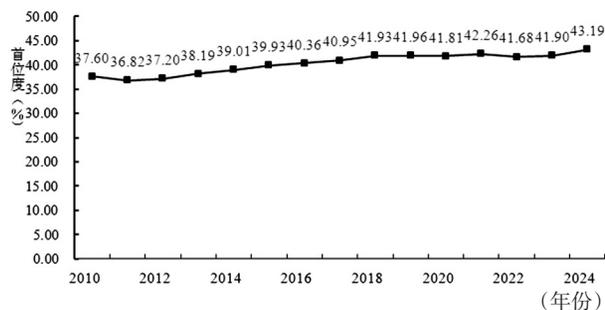


图2 2010—2024年北京的经济首位度及其演化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由图2可知,2010—2024年,北京的经济首位度大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于2024年达到最大值43.19%,这表明北京的经济实力在京津冀地区始终处于绝对核心和主导地位。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持续强化,推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高端要素加速向自身集聚,经济集聚效应呈现出自我强化的上升态势。与此同时,京津冀内部的经济空间结构表现出高度不均衡的“中心—外围”格局,北京的“极化效应”日益凸显,对周边地区优质资源的吸附能力不断增强,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这种“强中心、弱外围”的空间结构性失衡不仅制约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也不利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过度集聚带来的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的同时,津冀地区则面临发展动能不足的困境,区域一体化进程受阻,协同发展成效受损。

3. 珠三角的政策协同困难

珠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香港、澳门毗邻,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城市地理位置邻近,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相似,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但由于各地在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产业发展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时常出现政策协同冲突,弱化了经济协同效应。具体而言,一是跨区域合作难度较大。香港和澳门与内地在法律体系、税收制度、金融监管、职业资格认证及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形成制度性壁垒,增加了跨区域合作的协调成本。2022年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站发布的《广东省关于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典型案例(第一批)》指出:粤港、粤澳之间存在的制度性差异清单超过150项,涉及医疗、教育、法律、工程建设、数据跨域流动、专业资格互认等领域。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标准不一、执行力度差异明显,导致跨界污染治理协同困难。以空气质量为例,2023年深圳、珠海等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已降至18微克/立方米,而广州、佛山等城市仍维持在23微克/立方米,区域空气质量改善不均衡。三是产业发展步调不一致。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能级差异显著。2024年深圳GDP高达3.68万亿元,而珠海、中山、江门等城市GDP为4000多亿元,约是深圳的1/8。深圳的服务业发达,占GDP比重高达62.13%;而佛山、东莞、中山等城市以制造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服务业占比低于50%。经济发展和产业能级的梯度差异导致各地产业政策导向明显不同:深圳聚焦现代服务业发展,而佛山、东莞、中山等城市则以现代制造业为发展重点。

四、成因分析

造成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脱钩的邻近性困境,主要归因于制度性障碍、发展路径依赖以及文化与认知差异等行政、经济与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交织与强化的方式,制约了地区间要素的高效流动与资源整合,阻碍了协同效应的生成。

(一)行政区经济逻辑下的要素分割与激励扭曲

行政区经济逻辑通过对要素跨区域流动设置制度性壁垒,并嵌入以增长竞争为导向的地方政府激励体系,构成了制约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双重制度障碍。一是行政边界对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分割效应。行政边界通过制度、政策、管理方式等差异,人为构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产生行政边界效应,阻碍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二是财政体制与政绩考核机制的制度性约束。地方政府的逻辑深受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的影响,形成以增长优先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财政体制上,地方政府在承担大量公共服务职责的同时缺乏稳定

的财政收入来源,导致其对土地财政、招商引资、税收竞争等短期行为高度依赖。政绩考核上,“唯GDP论英雄”的政绩导向仍是政府主流理念,使其倾向于内卷式发展而非协同式合作。因此,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晋升双重驱动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资源和精力优先用于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和公共服务完善等显性指标上,强化“以我为主”的发展导向;而对跨区域合作缺乏积极性,导致跨区域共建共享机制缺失,常常出现搭便车或恶性竞争行为。

(二)强中心发展模式下权能与机会非均衡分配

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源于强中心发展模式所形成的资源集聚惯性,导致地区之间发展权能与机会的非均衡分配,拉大了“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地区发展差距。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强中心发展模式的极化效应。强中心发展模式将资源高度集聚于中心地区,虽强化了中心地区的增长动能,但也因外围地区政策支持不足和资源获取受限,导致其发展能力持续弱化,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二是“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理应产生正向外部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但在实践中,许多中心地区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局部范围的“辐射效应”,但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导致“虹吸效应”较于“辐射效应”更为显著且影响范围更广,从而使外围地区的资源持续向中心地区集聚。即使存在来自中心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但因外围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和公共服务欠缺导致配套能力不足,造成产业承接常出现“接不住、留不下”的窘境,外围地区逐渐丧失发展机会。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形成往往受制于路径锁定与制度惯性。路径锁定表现为早期资源分配不均和政策倾斜在后续发展中不断被强化,形成自我延续的格局。制度惯性体现在既有的行政分割管理体制和固化利益分配结构难以突破,制约了协同发展的政策落地与有效实施。一旦中心地区获得先发优势,在路径锁定与制度惯性的双重作用下,其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差距将会持续扩大,导致区域发展失衡日益加剧。

(三)非正式制度下的文化认同差异与认知壁垒

文化与认知差异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影响区域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与合作偏好,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构成潜在阻

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文化认同差异会影响合作意愿。地方文化认同差异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历史记忆和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性因素,一定程度地影响地区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文化认同差异导致地区间的信任缺失,降低了合作的意愿和效果。二是区域发展理念与目标的分歧。不同行政主体由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往往倾向于制定服务于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一定程度地忽视其他地区的利益诉求,造成地区间政策协调困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地理邻近与经济协同脱钩的典型现象,“近而不联”集中表现为产业同构突显、空间结构失衡和政策协同困难。究其原因,行政区经济逻辑下的要素分割与激励扭曲、强中心模式带来的权能与机会分配失衡,以及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文化认同差异与认知壁垒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层梗阻。破解这一邻近性困境,需要从制度创新、空间优化、文化融合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协同性的区域发展新机制。

第一,创新区域协同共治机制。一是改革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将区域协调发展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加大对跨区域合作、要素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指标的评估权重,引导政府目标由单一辖区利益转向区域整体利益。推动财政转移支付与区域合作绩效挂钩,通过财政激励机制的设计,提高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积极性。完善地方干部跨区域交流与培训机制,提升区域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二是构建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搭建多层次、常态化的区域性协调平台,建立健全高层级的联席会议、联合决策与协商谈判机制,强化跨行政区划的沟通协作能力。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造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数字化协同系统,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和行政运行效率。三是强化政策协同保障。探索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要素流动机制和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破除制度层面的碎片化障碍,

提升政策适配性与执行效能。完善区域合作的立法与政策保障体系,明晰各方权责关系,强化制度约束与激励机制,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法治基础与政策支持。注重区域发展战略与国家重大战略的有机衔接,增强战略协同效应与制度联动优势。四是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一体化。打破行政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推动统一市场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

第二,优化网络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亟须塑造起多层次、网络化的空间组织架构。为此,应从三个方面协同推进:一是构建多极网络空间组织。打破传统单一中心城市过度集聚、辐射半径有限的巨核发展模式,加快培育多个功能互补、层级有序的区域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间的快速交通与要素流通通道,形成以多中心协同、网络化联系、高效化流动为特征的空间组织形态,可以有效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效能。二是深化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引导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差异化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与功能互补,强化区域空间结构的稳定性与韧性。三是加强对外围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外围地区的倾斜,增强外围地区的产业承接与服务配套能力,提升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能力,有效缓解中心地区的集聚压力,形成梯度有序、联动融合的空间体系。

第三,深化文化价值共建。构建文化协同机制,消解非正式制度障碍,成为推动区域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为此,应从四个方面协同推进:一是加强地区间文化认同与社会融合机制建设,通过建立多层次的交流平台,增进不同行政区域社会群体之间的理解与互信,逐步消解因历史路径依赖和地域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合作壁垒。二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价值共识构建,强化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认同感,培育跨区域合作的社会心理基础与集体行动逻辑。三是注重制度设计中的文化适应性,鼓励在区域合作制度安排中嵌入地方性知识与认知多样性,提升政策工具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四是依托教育和媒介等社会渠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传播与普及,塑造有利于区域合作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注释

①本文未明确指明出处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政府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 [1]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20: 76.
- [2]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3]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4, 72 (4) : 100-109.
- [4]FUJITA M, THISSE J F.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1.
- [5]CAPELLO R. Spatial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high technological milieu: learning vs.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J].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4): 353-365.
- [6]CAINELLI G, MARIA E D, GANAU R. An explanation of firms' internationalisation modes, blending firm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microevidence from Ital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4, 46(4): 943-962.
- [7]AMIN A.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2): 365-378.
- [8]BEGG I. C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J]. Urban studies, 1999, 36(5/6): 795-809.
- [9]鲍群,张云云,赵秀云.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研究,2023,34(8).
- [10]廖斌,田彩红.地理邻近性影响了区域协同减排吗?[J]. 经济经纬,2024,41(5).
- [11]蔡英辉.政府间伙伴关系:合作治理之路[J].经济体制改革,2013(5).
- [12]马光荣,赵耀红.行政区划壁垒、边界地区公共品提供与经济发展[J].金融研究,2022(8).
- [13]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J].经济研究,2022,57(5).
- [14]余淼杰,杨伯焯,徐铭喆,等.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基于结构模型下量化最优补贴政策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7).
- [15]吴小波,曾铮.“圈层”经济结构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理论的分析框架[J].产业经济研究,2007(2).
- [16]吴传清,孟晓倩.虹吸还是溢出?——“强省会”战略的经济增长极效应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1).
- [17]高翔,龙小宁.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J].经济学(季刊),2016,15(2).
- [18]张可云,赵文景.社会资本与雄安新区创新发展:作用机理与政策方向[J].河北学刊,2019,39(3).
- [19]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 [20]侯杰,张梅青.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J].经济学家,2020(6).
- [21]李冰强.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与规则重构[J].中国行政管理,2017(8).
- [22]刘修岩,梁昌一.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综合评价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兼论城市群规模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2).

The Proximity Dilemma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coupling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Economic Synergy

Hou Jie Li Weidong

Abstract: Geographic proximity is often regarded as a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has not naturally transformed into economic synergy, leading to the dilemma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ng “close but not connected”,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in China. The phenomenon of “close but not connected”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highlighting of industrial homogeneity, spatial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difficulties in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causes lie in the factor segmentation and incentive distortion driven by administrative region-based economic logic, the imbalance in developmental capacity and opportunity alloc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strong-core model,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fferences and cognitive barriers 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level. These require innovation in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of cyberspace layout, and deepen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Economic Synergy; Close but Not Connecte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文 锐)